

- ▶ 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 ▶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专著
- ▶ 总主编 王修智 张 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论

| 董建才 主编 |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论

董建才 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论/董建才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207-809-1

I. 马... II. 董...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IV. 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978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全义

技术编辑: 蒋 方

责任校对: 超 凡

787mm × 960mm/16

21.5 印张 437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9.00 元

书号: ISBN 7-80207-809-1/F·682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责任编辑：苏全义
装帧设计：杨丰瑜

前 言

经省委研究同意，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于 2004 年 5 月挂牌成立。中心成立以来，在省委和院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形势的发展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创新。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中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短时期内难以改变，马克思主义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全党的一项十分重要和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从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与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代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所创立,并由后人依据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为目的,以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为己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and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成果中的经济理论部分,即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和被广泛认同的、正在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的经济理论。它们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含义而言,就是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依据,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矛盾与态势为参照,以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产业革命与结构演进、经济全球化为大背景,着重将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和创新性理论观点引入学科体系中来,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适合中国应用的部分加以整合和梳理。一方面使其由意识形态理论转化为学术理论,获得稳定的科学形式;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时代精神。做到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勇于学习借鉴,实现理论观点和学科体系的全面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作用。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应该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加以认识和处理。

*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下面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做了明确阐述的。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还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统观《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他是对生产的物质技术内容与社会形式并重而以对社会形式的研究为主的。他曾做过专门解释:“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的对象,……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定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②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后继者的列宁、斯大林都突出强调要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绝不像通常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③斯大林明确论断:“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④并相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斯大林的观点,借助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曾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理论界普遍接受。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经济建设的展开,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和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中国学者像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一样,开始独立思考问题,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随即展开。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迄今40余年犹未停止。争论主要涉及:①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否应该包括生产力。从50年代末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应当包括生产力之后,此主张一直有不少经济学者赞同。即使仍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同志,大多数也同意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应联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还有的主张政治经济学应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并由此催生出了一门独立的“生产力经济学”。②生产方式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一直有一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

分同志主张应将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认为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范畴即劳动方式,还有的认为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③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持批评意见者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把原本是生产关系法律用语的财产关系即所有制形式从生产、交换、分配诸关系中独立出来,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反对者则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狭义的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突出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还有许多同志认为,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中没有把交换关系单列出来是一种理论上的后退;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理应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④资源配置可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主要的研究内容。将资源配置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西方经济学广泛引进之后在一部分同志中兴起的新主张,并由此引发出了一场政治经济学是否应更名为经济学的争论以及西方经济学将资源配置限定为资源配置的得失评论。

上述争鸣发生于中国经济建设出现重大曲折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展于1980年前后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确立、思想理论大解放大发展之际,深化于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时。看似纯学术争鸣,实则是理论对于实践的积极回应。观点虽未能实现一致,但认识则大为深化了。那种孤立封闭地研究生产关系的空气较为彻底地被消除了,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流通、消费已经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

总结多年来理论争鸣的成果,并以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 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论断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论精神,但从其引致的脱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流弊和将交换关系排除在外等情况看,确有重大缺陷,已被证明不能满足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

2.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适当扩展。扩展的方向就是将生产力列入研究范围,突出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建立和完善的决定、带动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完善、进步对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矛盾的运动中,动态、发展和开放性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3. 研究对象扩展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应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为目的,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服务,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服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至于扩展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如何表述,则是可以进一步斟酌商量的。近年来较有

代表性的观点和在教材编写中实际贯彻的理论主张大体有以下几种：①恢复使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提法，即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②“以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经济活动是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④政治经济学在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也要把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即“生产力的社会结合方面”列入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促进生产力发展放在中心地位，“研究生产关系如何通过不断的改革去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⑤“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方式，即在一定生产力及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⑤

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扩展与界定问题上，对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须给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还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⑥与《资本论》对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界定不同，恩格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界定，是对“人类各种社会”而言的，一般地说，也应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们理应从中汲取科学营养。遵循这个思路，我们不妨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条件和形式，为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科学”。这个定义既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过程展开的“条件”，即社会经济关系，也强调研究社会生产的“形式”即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或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和运行，并主张将研究结合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来进行，从而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致性，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致用性和价值观，有利于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这个看法可以同以上几种主张一道研究参考。

①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 刘诗白：《走向21世纪的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我见》，载上海《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③ 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④ 吴振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⑤ 王元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第189页、第186～187页。

二、理论适用性的定位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反映。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包含若干阶段的漫长进程,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国现象而是多国现象,并且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阶段性规律还是总过程的规律?是重点揭示一国的经济运动规律还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普遍规律?抑或是无任何制度差异的一般性规律?这就不能不涉及理论适用性的历史区间定位和空间范围定位问题。这两个定位,都是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方向的大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诸问题展开争鸣以来,它就一直是争鸣的焦点之一。在理论适用的历史区间定位上,不少同志主张经济研究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着重于初级阶段”;^①认为“我们所要重建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能管30年、50年就可以了”;^②“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根本的实际出发,来解决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问题”。^③也有的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应有逻辑的统一性、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出发提出疑问:“如果定位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就会出现脱离目前实际的问题。而如果定位于现实社会主义,其研究内容又会与现行的方针、路线、政策绞在一起,削弱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④在理论适用的空间范围问题上,有的人侧重于强调理论的一般性和通用性,主张“全世界的经济学应该共建一座大厦”,“唯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类服务”,“通过对全球的关怀而使经济学真正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⑤强调“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着力点应是进入主流经济学”、“尽快融入主流经济学发展之中”。^⑥另一些人则侧重于强调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认为“现在我们讲经济学发展,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⑦

① 沈立人:《经济学的历史使命》,载《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4期。

② 晓亮:《困惑中的思考》,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③ 袁文平:《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科学》1998年第1期。

④ 卫兴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载《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⑤ 盛洪:《会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吗》,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295页。

⑥ 杨旭东、孙平:《“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⑦ 洪远朋:《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中国经济学的优势在特色，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充其量是个转述者”。^①可见在理论适用性定位问题上，理论界的认识很不一致。要使意见由分歧乃至对立变为相对一致，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大前提下，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察认识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中寻求启示，把握解决问题的原则与方向。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始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道路和战略问题。其要点，一是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看问题、做事情；二是既不丢掉老祖宗，又不搞本本主义，大胆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大胆借鉴，敢于继承，决不照搬。由此得出的启示是：理论不能脱离实际，而要积极地反映实际，能动地指导实际；理论上的吸收借鉴，必须服务于自主发展；理论研究贵在创新。

遵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方法及其启示，可以得出如下看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为己任。也就是说，在理论适用的历史区间上要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重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规律，而非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阶段或全过程的经济规律；在理论适用的空间范围上定位于着重反映中国经济建设规律，而非“世界性”通用规律。这是一种在展示理论的具体性、特殊性的过程中展示其所蕴涵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研究路径。这样一种路径比较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及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论适用性定位的主张是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的。

1. 是由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交换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是不同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不可能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一样。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完成了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②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善于从特定社会的特定经济条件出发，把握经济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特殊的、具体的，但对于具有大体相同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则具有一般性。就中国来说，广大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集中力量研究和揭示中国特色经济建设的规律性。

^①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第11页。

但这些特殊的规律性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结合、体制转型、后发展经济大国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路径等,又必然具有不可预计的世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搞研究,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和伟大的价值。

2. 是由经济学的致用性决定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之学,从来都是为特定国家、地区的特定人群服务的。其理论内容、特色乃至其创新点必定会反映或受制于它所服务的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特点和族群利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还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由以上特点所决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能不带有“中国特色”。反映在理论定位上,就不能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着力于揭示蕴涵以上诸多特殊规定性的经济运动规律。

3. 也是为经济理论发展的史实所证明了的。经济理论史的大量事实证明,那些有作为的经济学家无不是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为紧迫、最亟待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出发去搞研究的。那些名垂青史的名家名著,都是因为较好地回答和解决了一两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为社会造了福,历史才牢牢记住他们。一位经济学家曾坦言: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学说大多扎根本土。并指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是因为这本小册子解决了当时与海上霸主荷兰、比利时相比还是小国、弱国的英国的大问题,影响了当时的政策,促使英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世界霸主。德国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其中建立的广义生产力理论很好地研究了如何发展德国生产力的问题,使当时落后的德国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国家。^①事实上,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历史。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问题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垄断出现后竞争的均衡问题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为应对大危机后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则是为解决发达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滞涨而产生的。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所以使人们至今不忘,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立足所处的时代,研究和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总之,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要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方法,还是经济科学的性质、特征及经济理论史实来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为己任”的理论定位都是科学的、正确的。

^① 熊应梧:《中国经济学之根在本土》,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1页。

三、理论的引进、借鉴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经济理论的引进、借鉴，更离不开创新。正确处理引进、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从引进和借鉴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始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学习、引进与借鉴的重点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从 1957 年起中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在 1960 年前后由毛泽东带头，初步纠正了对原苏联教科书全盘接受、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苏联教科书那一套。其结果，一方面是把原苏联的经验传播到中国，使中国能够迅速恢复经济，较快地建立起了工业基础，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培养经济理论队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引了进来，使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商品经济消亡论和半商品经济论等传统经济观念扎下了深根，消极影响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借鉴乃至应用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以引进借鉴新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为主，80 年代下半期以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借鉴为主，进入 90 年代以后则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引进借鉴为主。20 多年来可以说是热点不断，持续升温。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借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改进经济学研究教学也有不小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消极面：主要是不顾国情，照抄照搬，不适当地夸大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有意无意地排斥、贬抑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过分追求理论的通用化、数学化和学理化，文风晦涩，冲淡了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亲和性。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其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对外国经济理论的积极引进和借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则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健康成长；引进、借鉴的目的是服务于创新，基于实践的自主创新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完善的立足点和原动力。

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个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建设也适用，即：必须在积极吸收、借鉴国外

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前提下，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规律，从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理论的创新，一般而言主要体现于：①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新的领域，以扩大其适用范围。②在经济理论的某些方面已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时，或者设定新的前提，或者做出新的逻辑证明和论证。③当原有理论对某类社会现象已经无法解释时，做出全新的理论解说。④进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提出来的一项理论任务，目的是把握规律，指导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既要是对原有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又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讲求科学性，又要注重适用性。需要从理论观点到方法、对象、体系结构进行全面性、整体性创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经济理论观点的指导，突出把握好以下几点：

1. 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理论前提。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精辟回答，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要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创新，使经济学能够系统地回答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适应生产力要求完善和变革经济制度和体制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如何运用发展生产、完善制度、调节分配等手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还要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要求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做出全新的概括和阐释。

2.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历史观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基于国情特点的理论概括，是观察认识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制定战略策略，选择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基础。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认识和观察社会主义的劳动形式、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生产组织、就业方式等问题，从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形态、进程、方式有一个清醒的和科学的判断。

3. 以经济发展论作为主题。“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把这个“硬道理”作为主题突出出来，弄清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发展的目的性及内涵的全面性。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突出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

4.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贯穿始终的红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最为重大的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以此为主线，使之体现于经济发展、运行、体制设计、经济调节等各方面。在理论上要搞清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依据及其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异同等。

5. 以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特征。作为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上的新突破、新发

展,反映时代的新进步、新特征,反映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新关系和进行往来、交换的新机制、新形式。总之要体现时代性、具有开放性,要有世界眼光。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理清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适用的历史区间和空间范围以及引进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研究些什么、怎样进行了。这里仅粗略地提出一些看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特定的对象、方法的经济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在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争鸣中持续发展着的经济学。它在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者和奠基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许多基本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并没有因历史的变迁或反对者的攻击而失去其价值,至今仍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态必须因时而变,其内容也要与时俱进。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性质、特点、地位和发展的道理是在研究之初首先要讲清楚的。

接下来就要转入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主题——社会生产的研究。第一要研究的是生产的价值形式、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非制度层面的问题。从社会生产的基础层面开始、而不是先从研究“经济本质”开始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原则。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而非实物生产,因而第一就要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讲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属性、价值创造、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等问题。第二要研究财富的生产即生产力问题,如生产的要素、结构、组合、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经济效率和效益问题。第三要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随后展开对社会生产的另一面——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研究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则主要研究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应讲清具体制度、经济体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联系、区别及其形态和构建。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流通过程及生产总过程的研究得以展开。研究的重点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运行的形式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性及实现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规律,国家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的体系、目标、任务等,是需要考察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以生产、消费的内在联系为客观基础,凸现了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人本价值观,今天看来仍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西方学术界对需求研究的新认识、邓小

平的共同富裕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人的全面发展论和现实生活中的休闲经济、假日经济，都是理论的闪光点和创新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还是一个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并向特定社会发展目标逐渐逼近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再生产过程研究基础上，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因素引进来加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开放性、阶段性和历史性。在这一部分，社会主义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条件等问题也要给以恰当说明。

上述内容，就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六层次思路。把这个思路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梳理，则可以细分为十个问题即“十论”。

1. 导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及其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2. 劳动价值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位”的经济学理念，劳动价值论的原创意义及当今面临的挑战，当代劳动发展的新趋势及创造价值的劳动在内涵外延上的发展变化，服务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及其价值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等。

3. 生产力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论证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说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研究：“三个代表”与先进生产力；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要素组合规律及生产力经济；生产力形态：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与科教兴国等。

4. 经济发展论。介绍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研究：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历史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及得失，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

5. 经济制度论。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分析法与经济制度研究；厘清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与区别；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按要素分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设计与体制重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6. 市场经济论。介绍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和他关于未来社会商品关系消亡预言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邓小平“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革命性论断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研究：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结合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特征、在中国生成，市场经济的规律、机制、市场体系、市场秩序、中介组织、法律体系完善。

7. 宏观调控及国家职能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与

国家职能理论，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及金融、财税、投资等项体制改革，经济运行、经济利益、收入和分配的调控及相关的理论、政策。

8. 生产目的论。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邓小平“本质论”对生产目的的新阐释，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需求、人的需求的全面性及其满足，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还要研究休闲经济、自由时间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9. 经济开放论。介绍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研究：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与当代经济的开放性，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区域化，世界经济组织与规则，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过程与成效，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与对策。

10.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趋势论。重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及现实趋势，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国情，“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及前景。研究分析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物质技术基础的生成，实现过程的漫长性与确定性。

这个“十论”的研究框架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反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国特色的一些新认识、新结论包括进来，力求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一个新面貌。故不揣浅陋，提出来供同行参考。

董建才